

南风之薰

回音壁

那晚，他们没见面

张梦阳

印象中，有关端午的考证著作以及论文，好像并不是很多。这当然不包括那些人云亦云、拼凑抄袭的小册子。记得闻一多先生曾经对于端午的来源用过功夫，于是把家里那套开明书店辑存的《闻一多全集》找了出来，再重新翻看了一遍，除了那一篇著名的《端午考》之外，还有一篇文史随笔《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两篇的风格不同，而论点却并无变化。

又在网络上找了一遍，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完整的考证著作，只有黄石先生上世纪60年代做过一部《端午礼俗史》，收在对岸一套民俗丛书之内，论证详切，而且有自己的看法。黄石在30年代就是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燕京社会学系”大旗下的重要一员。

读下来，闻一多先生与黄石先生都认为，把端午的源起派在祭屈大夫的头上，实在是一个民俗上的“误会”。闻先生戏称为一个“谎”，那谎的来源，最初是《世说新语》，但最“盛传”的是在南朝梁吴均的那一部《续齐谐记》里，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自白昼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常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为蛟龙所窃。今

孙犁先生赠字

常跃强

1991年1月初，一天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我收到了孙犁先生的一封信。当时拿到这封信时，我很高兴，但同时也挺纳闷：孙先生刚回了我一封信，又追一封信，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心存疑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封信，把信抽了出来。抽出来我才知道，这不是一封信，而是孙犁先生用宣纸写的一幅斗方，上面用毛笔写了八个大字：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从落款看并不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人的名字很陌生，在文坛上也没有什么名气，过了这么多年，我实在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这一定是孙先生寄错了，才寄到了我这里。他年纪大了，跟他联系的人又多，偶尔出那么一回错也是有的。后来我又想，我多次想请孙先生给我写幅字，一直没好意思开口，哈，这回机会来了。于是，我立即给孙犁先生去信求字，并把他寄错的那幅字夹在里面，给他寄回去了。

过了不长时间，孙犁的信就来了，里面如我所愿夹了一幅很大的字。孙犁先生在信中写道——

跃强同志：

今早收到来信，随即找了一幅字，题款寄奉。我不会写字，山东书家如



云，一定惹人发笑了，留个纪念而已。今冬，我连续犯腹泻旧疾，身体很受影响。然亦无大碍，希勿念。专此，祝好！

孙犁

一九九日上午

看了孙犁先生的信，接着展开孙犁先生赠与的那幅墨宝。上面写的是——

文章如土欲何之，
翹首东云惹梦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
春兰秋菊不同时。

看得出来，这幅字是早已写好了的，也是孙犁先生认为写得较为满意的一幅。左上角的题款“跃强同志留念 1991年1月9日”，是后来补上去的。我很感动，当即写了一封信，向孙先生表示感谢。

当年我第一次拜见孙犁先生时，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跃强，你读书少！”孙先生一语击中我的软肋，我收到他写的鲁迅这首诗，除了第一时间勉强能懂，再往下连起来就不知道是啥意思了。书架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我在第七卷的第432页，找到了孙犁给我书写的那首诗。诗题“偶成”，下面只有一条注释：“《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又为沈从泉书一幅云：‘文章如土欲何之……’”这注释对于我来说等于没注，我还是弄不懂。后来，我在一所大学里，请一位研究鲁迅的专家朱教授给我讲一讲。朱教授看了孙犁先生的信，接着就称赞孙犁先生的文章。他说：孙犁先生晚年的文章，那真是圆熟，就跟蚕老了一样，浑身透明，吐一口就是丝。……他给你写了这么多信，还给你书写这么大的条幅，很难得！你要好好保存呀！

我说：那是！那是！

接着，他就给我讲鲁迅先生的那首诗。对最后那句，还讲了两中不同的解释和自己的看法。讲完之后，他从书橱里拿出一本文物出版社1976年8月出版的《鲁迅诗稿》，翻开，找到了鲁迅先生书写的那首《偶成》。朱教授说，鲁迅先生的书法，风格独具，古雅厚重，金石味浓。你看，他用手指着最后一行诗时说，这里只剩了一个“时”字，按说这是书法上的大忌。可是鲁迅先生补救得好：一，他把这个“时”字稍微拉长了一些。二，“时”字下面隔一个字宽的矩离，写下了稍小一些的五个字：“松泉先生属”，接着写下了“鲁迅”两个字，然后盖了一方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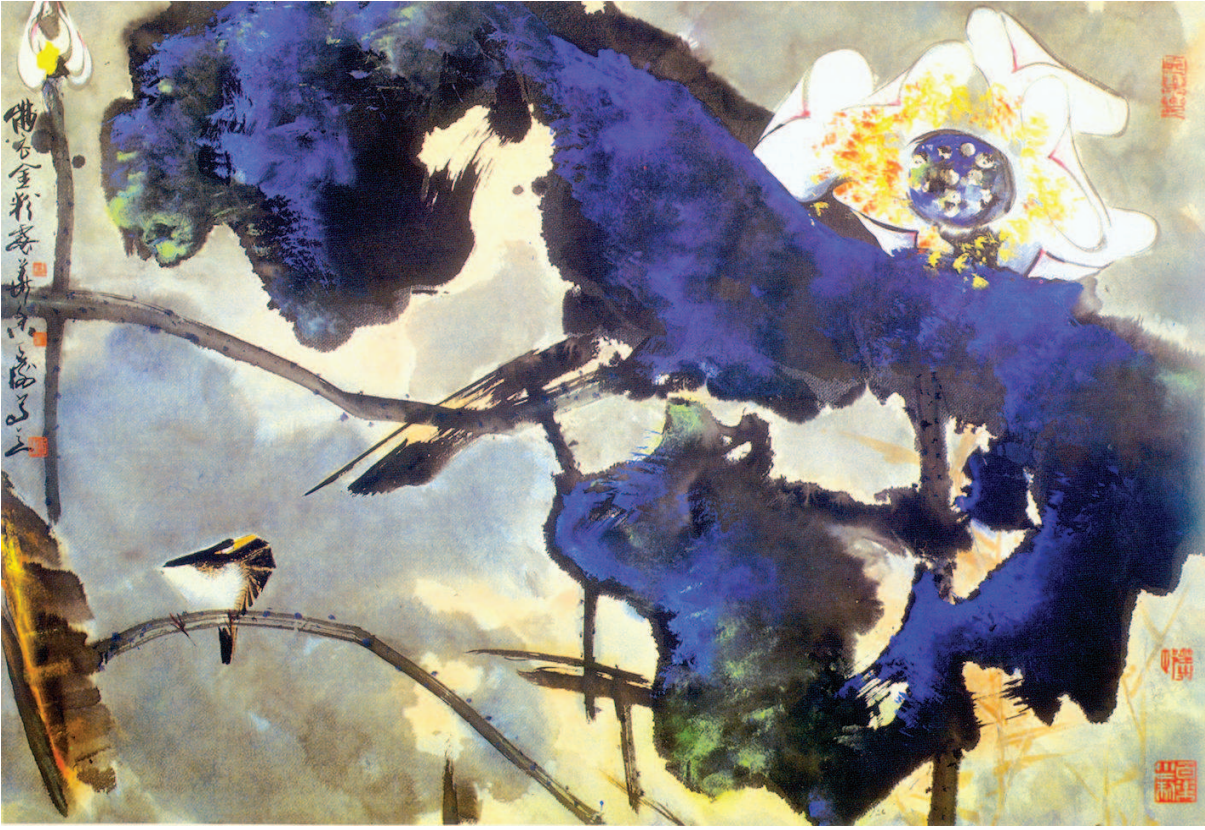
从朱教授那里回来不久，我就把孙犁的这幅字装裱了，直到现在，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再后来，我向孙犁先生学习，也拿起毛笔学起了书法，学米芾，临《方圆庵》，读了大量书法方面的书，看了很多名家的字帖。这时再看孙犁先生的字，就有了新的看法。孙犁先生是懂书法的，他小字写得好。他给我的十多封信，无论是用毛笔写的，还是用钢笔写的，那字都挺好。你从他的字上可以看出，孙犁先生是读过不少字帖的，那字有来历。而孙犁先生待人的热心、诚恳和坦荡，更值得我永生铭记，好好学习。

起来了呢？

而且，古来祭屈子的祠堂之类，并不多见，即使在相传屈子投江的汨罗之旁，亦未见古来的屈原庙，湘人亦不于端午祭屈原。黄石先生说，如果角黍确定是专为屈子而设的祭品，龙舟是特为他招魂而来竞渡，那么事物都具备了，何不就在江边祭他一番，或在龙舟上安设牌位致敬呢？但找遍载籍，旷观南北，都极罕见。特备的角黍，大家只往自己肚子里送而已。只在大有送瘟的龙舟，设有三闾大夫像，杂于十数人物中，送到青龙堤焚化，这到底是把三闾大夫算作什么？是鬼是神，是招是逐，是敬是恶呢？主张吊屈原的人士，怎样强辩，也说不出个道理来。

黄石先生证以《夏小正》中“此日（仲夏月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又《礼记》中“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之文，认为“仲夏月的午日，毒气弥漫，宜乘水临风，以泽兰众药入清泉行洁礼，以辟恶去秽。这和后世于午日惶惶然走于郊野，什采百草众药，又争汲‘龙船水’为辟恶治病、解瘟消毒之俗，一线相承，自古至今，一致以五月为恶月，午日为特别可怕的凶日，适相吻合。以此为端午的滥觞，虽不中不远矣。”由此，再来看“屈原说”的两大支柱：角黍和竞渡，应该作如此解释：龙舟实际是法船，藉神明或巫师的法力，把五瘟鬼拘捕，划出大海后，一把火烧掉，把瘟鬼或远远放逐，或沉于海底，总之第一要义是送瘟禳灾，维护生命是最高目标。至于角黍，早黍仲夏月便有收获，尝新荐寝庙，取为郊社之祭，是应时顺理之举。祭毕散祚，用叶包裹更是方便，所以便有后世“裹粽”这样的方法。此外如以周处《风土记》为说，则是“取阴阳包裹未散之象……所以赞时也”，那在“应天顺时”这个古来礼俗的大原则上，更是完整了。

当然，端午起于辟病禳灾说，并非自黄石先生始。与黄石先生应是同辈、但在民俗学界的影响更大的江绍原先生，早在1926年便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三天发表了一篇长文《端



佛衣金粉露华浓（国画）韩天衡

一次人生奇遇

吴钟麟

这件往事堪称我的人生奇遇之一，与前不久去世的著名演员王丹凤有关，现在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那年我在华东师大求学。要欢度国庆了。学生会“大学生之家”拟请当红电影明星王丹凤——那时《小燕子》满校园飘响，如果能邀请到王丹凤来校与大家一起国庆联欢，那就太好了。“大学生之家”决定由我写邀请函，因为其中唯有我是中文系的。我当下满脑嗡嗡响，说来惭愧，长这么大还从未写过信，没机会写，现在一下子要给人名而且是大红大紫的电影明星写信，我真怕因没写好这封信，请不来大明星，辜负全校几千师生的心愿。我把自己关在文史楼北向的小教室里，冥思苦想，在信中极尽溢美恳切之词，可谓字敬仰虔诚。信寄出后，我如坐针毡地等待回复。天遂人愿，王丹凤回复应邀。为庆祝首函告捷，我特地买了方块鹅牌咖啡与大家同饮。

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该怎么去接大明星呢？上世纪五十年代，不要说私家车，就是偌大一所部属名校也只有辆黑色道奇轿车，是供孟宪承校长、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溟萍及苏联专家使用的。孟校长及苏联专家不

午竞渡本意考》。这或是现代对于端午古俗进行“再思考”的开端之作里，最为人称道、影响也最为广远的一篇。黄石先生礼俗史里的不少论断，应该也受到了江先生《本意考》的很多启发。江绍原先生在文中说，端午竞渡之事，吴以为与伍子胥有关，越以为起于勾践，楚又另捧出其地的忠臣屈原，其实此俗比这三个人都早，只是后来三地的人都想把这个风俗归到本地的某一位大人物身上去而已。从《古今图书集成》所引的《武陵竞渡略》中所谓“送标”的说法，可以知道竞渡的前身既不是一种娱乐，也不是对于什么人的纪念，而是一种“禳灾”的仪式：“直趋下流，焚诅咒魇疵疢天札，尽随流去。”江先生遍引遍述之后，概括起来下判断说：“竞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龙舟竞渡或者说整个端午礼俗的原意，必须离开了屈原、伍子胥、勾践等去求，才能求得也。

江绍原先生的论文与黄石先生的大著，都是“天才之笔”。用细密的理路、谨严的逻辑和灵动的联想，可以说是把一个自古相传的端午习俗的源头本意给“窥破”了。这种“窥破”本相的翻案文章，当然是让人佩服和惊叹，后世如此厚厚累积起来的密不透风的层层“包裹”，作者能够凭着耐心、细心和灵性，把它们再一层层地抽剥开来，露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原始本相”，那一种欣喜和兴奋，不能说是不深切。不过，正是因为过于欣喜和兴奋，也容易太过于把那个好不容易“露出头来”的原始本相视作“珍宝”，至于那些“剥剩下来”的满地的后世“包裹物”，却往往看不出它们的价值，甚至无意中看作“废弃物”而任其飞逝。这一点，由我个人看来，像江先生和黄先生这样的大家，也有点不能免。江先生在文中说：我们既然不都是楚人之后，为什么要特别来替屈原“捧场”？黄先生在书中也说，如果角黍真是屈原的祭品，那么拿来馈赠亲友，“岂不是把他们当水鬼一样看待？”这多少都有点说得太重太硬了。

同样是不信端午起于吊屈原的说

法，我们回到闻一多先生这里，却发现他说得更温暖一点。他说这是一个“谎”，但这个“谎”里有“真”。下面一大段话，出自他的《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一文，说得实在是好，必须抄录在这里：

吃粽子这风俗真古得很啊！它的起源恐怕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古代吴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龙子’的身份，藉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所以有那断发文身的风俗。一年一度，就在今天，他们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吃，一面也自己吃。完了，还在急鼓声中（那时许没有锣）划着那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作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这一切，表面上虽很热闹，骨子里却只是一副战栗的心情下，吁求着生命的保障。所以从冷眼旁观者看来，实在是很悲的，这便是最古端午节的意义。

一二千年的时间过去了，由于不断的暗中摸索，人们稍稍学会些控制自然的有效方法，自己也渐渐有点自信心，……但是，莫忘乐观！刚刚对于克服自然有点把握，人又发现了第二个仇敌——他自己。以前人的困难是怎样求生，现在生大概不成问题，问题在怎样生得光荣。光荣感是个良心问题，然而要晓得良心是随罪恶而生的。时代一入战国，人们造下的罪孽想是太多了，屈原的良心担负不起，于是不能生得光荣，便毋宁死，于是屈原便投了汨罗！是呀，仅仅求生的时代早过去了，端午这节日也早失去了意义。从越南到今天，应该是怎样求生得光荣的时代，如果我们还要让这个节日存在，就得给他装进一个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意义。

但这意义着想，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当的象征？是谁首先撒的谎，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端午，以求生始，以争取求生得光荣的终死，这谎中有无限的真！

只要端午无限地延续下去，这个“真”就也会无限地“保真”下去的吧。



佛衣金粉露华浓（国画）韩天衡

你们是未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能够得到你们的邀请，我感到万分荣幸，谢谢

谢谢！”又深深一鞠躬，下面一片掌声。接下来自然应邀唱《小燕子》。这是我首次近在咫尺聆听名家歌喉。起初她一人独唱，继之女生随声合唱，不久便成了混声大合唱。国庆联欢气氛热烈，略施粉黛的王丹凤唱得满脸绯红，把《小燕子》连唱了三遍。随后有人提议王丹凤跟大家跳交谊舞——自陈毅市长下令开放后，国庆必舞起翩翩——但交谊舞一开，万难收场，而王丹凤的时间很紧，她还要赶往下一所大学。

然而群情高涨，从正门出不去了。于是急中生智：攀爬后窗出去。先在窗下搁上饭桌，由我搀扶王丹凤手臂，协助她跨越窗槛，我一边搀扶一边频频致歉：“太难为您了！太说不下去了！”她小心翼翼地跨越窗槛，一边大度地对我说：“没关系的，都怪我们跟群众接触太少，就当一次京剧吧！”作为学校国庆联欢会贵宾的明星王丹凤，就这样爬窗离开了会场，离开了华东师大。这在古今中外的演出活动中，恐怕是难得一见的吧。



1924年10月，主编《晨报副刊》的孙伏园因为鲁迅的《我的失恋》被撤下，愤而辞职。不久，《晨报》主人邵飘萍先生听说孙伏园离开《晨报》了，就请他到《京报》创办一个副刊。

1924年12月8日，《京报副刊》即在孙伏园主持下与读者见面了。此后，《京报》的读者一天比一天多，最多的一天增加了两千份以上的订户，印刷所加班，送报的加人。邵飘萍一次对荆有麟讲：印刷工人和发行部人竟发出怨言，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从中可以看出，《京报副刊》影响大了。而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是广大青年要看鲁迅的文章，因而纷纷订阅《京报》。鲁迅先生也没有使青年人失望，自《京报副刊》发刊后，对于时事及学术、社会、文艺各方面，都有文章发出。

有鲁迅的热心支持，再加上当时在文艺界很盛名的周作人等，也都常有文章发表，《京报副刊》便风靡北方，“纸贵洛阳”，孙伏园“副刊大王”称号也叫得更响了。

《晨报》颇受打击，找孙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地以胜利者的笑容拒绝了。《晨报》只好请诗人徐志摩来接编。

徐志摩是孙伏园的朋友，所以他们俩虽编着几乎可以说是敌对的报纸，却没因此减却两人见面的机会。相反，因为志摩也编着副刊，为了拉稿的关系，两人常常碰头，他们经常交换意见，交换批评，甚至交换着旁人对他们所编的副刊的好恶消息。

当时正是徐志摩走向社会活动的时代，每月茶点召集贤人淑女的新月会议；在北大等校又讲授着英国历史上的诗人——拜伦与济慈；他表扬他的客厅的新诗《石虎胡同七号》，也吸引青年争相拜访。但他却忽然转兴，发表起有关政治的杂文《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孙伏园把这篇杂文拿去给鲁迅先生看，还问了鲁迅的意见。过了几天，志摩又与伏园相见了。从未与鲁迅会过面的志摩问起，他那篇文章，鲁迅先生的意见怎样？

伏园直爽地答：“鲁迅先生说那篇文章写得真好！”

然而，正以诗人身份在文坛上争辉的志摩，感觉到鲁迅是在讽刺他了，立刻说：“他骂得我好苦呵！”

伏园立即解释说：“这次鲁迅先生可不是骂，是说真好！”

陈子善先生5月4日在“笔会”上发表《鲁迅见过徐志摩吗？》，提出了徐志摩是否与鲁迅见过面的问题。我记得，1921年8月鲁迅在《〈狭的筈〉译者附记》中对泰戈尔赞成“撒摆”（寡妇与亡夫一起办丧）提出批评，以及除给《京报副刊》写稿外，还给《语丝》《莽原》《猛进》《国民新报副刊》等报刊写文事，却没有给过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一个字。由此可以判断，1924年5月8日，鲁迅晚上同孙伏园一起以一般观众的身份往协和校园会堂观看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诞辰演《契武罗》脚本二幕，看到台上的徐志摩，徐志摩这时或在其他场合也看到过鲁迅，而鲁迅虽然赞扬过徐的杂文，政见还是不同，所以上演完后，没有上台与徐志摩会面，就半夜回家了。



「文汇报笔会」
微信二维码